



北宋 BEISONG
SHIXUE SIXIANG LIUBIAN YANJIU
史学思想流变研究

李峰◎著



人民出版社



北宋 BEISONG 史学思想流变研究 SHIXUE SIXIANG LIUBIAN YANJIU

李峰 ©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封面设计:黄桂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李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01-012833-7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史学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K092.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4210 号



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

BEISONG SHIXUE SIXIANG LIUBIAN YANJIU

李 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30 千字

ISBN 978-7-01-012833-7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李峰博士的大作《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即将出版,索序于我。作为作者博士论文指导教师的我,虽然一开始即参与了这部著作主题的思考与讨论,但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深入研究与修订,李峰博士呈现给读者的这部论著,无论是内容的丰富还是思想的深刻,早已较之最初的文本厚重了许多,也给予了读者更多的思考。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向有两晋、两宋以及清代高峰诸说。其中两晋说的代表者是首倡“史学应有专史去叙述”的梁启超,其《中国历史研究法》称:“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著……故吾常谓,晋代玄学之外惟有史学,而我国史学界亦以晋代为全盛时代。”持两宋说者的代表是陈寅恪,其“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今古罕匹”的观点,最为论史学者所称引。挽近,则又有台湾大学治史学史的杜维运氏,独张清代高峰说一帜,直指陈寅恪之两宋高峰说,谓“中国史学”至清代,乃“迈入一新境界”,“又岂远不逮宋代史学哉”?!当然,学术之见,见仁见智,然若单以史学思想论,则我们还是要说,两宋时代的相关内容,似较之其他时代,相对可能要更富一筹。而且,论述宋代史学的论文论著虽然不少,但是结合整个学术以及社会政治清晰勾勒史学思想演进路向的论著,似并不是很多见。这也是我与李峰博士讨论并提出学位论文选题的初衷。当时为了把问题发掘、讨论得更深入,以免有浮泛之弊,我们最终决定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北宋,而重点则讨论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的线索与事实。

所谓“流变”,顾名思义,就是指史学思想的演进,如水之绵绵,后来者既是对前者的继承,又是对前者的否定,并在否定、继承的张力间形成新的流向态势,从而完成史学思想嬗递之间的接受与拓新。应该说这种历史主义的思考方

法,也是中国史学历来讲求的“通识”的认识方法。

中国史学向有讲求“通古今之变”的“通识”传统。而这种“通识”之于学术,于内、于纵,便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于外、于横,则是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若用现代学术语言讲,前者或可称为“内在理路”的梳理考察,后者则或可称为学术与其发生之背景或语境的结合论述。这里李峰博士论著所谓“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顾名思义,也就是要结合“考镜源流”与“知人论世”,即结合史学思想演进的内在理路与思想流变发生之背景或语境,揭窳北宋史学思想显现的流变格局与态势。

按照“考镜源流”与“知人论世”结合这样一种内外、纵横相结合的思路,李峰博士将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的发生,溯源于中唐。认为北宋的史学思想,实是中唐以来整个学术思想合乎逻辑的演进。至于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的展开,则是北宋士阶层对于北宋政治文化态势下提出的时代命题的思考与回应:

——北宋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北宋的士阶层是怎样认识和回应这个时代的?

——在回应时代问题时,北宋的士阶层都关注了哪些历史问题?对历史作出了哪些思考?又提出了哪些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具有哪些学术特点?史学思想的流变中又与哪些学术问题有所牵连?这些史学思想随着时代的迁变又形成了哪些流变及走向?

凡此种种,李峰博士都已在他的论著中作出了相应的探讨。当然,具体讨论到了哪一步,论述得如何,读者还是要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后作出自己的评判。

学术对话总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它能使人在思想中感受到存在。我想魏晋名士们痴迷于挥麈玄谈,或可能也是因为有着某种类似的快感或美感吧。李峰博士淡泊名利,敏事讷言,但言及学术则滔滔。我与李峰博士师友之间,每忆及或与之小酌,相与渐入微醺而辩愈急。古人谓聚天下英才而育之为人生一乐,或有此之一谓耶?

是为序。

向燕南

2013年7月于半野厂

前 言

北宋史学思想的变迁是汉唐学术合乎逻辑的发展,其中始于庆历之际的史学新变与中唐的新史学运动有着直接的学术关联。孙复、孙甫、欧阳修等于庆历之际史学新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宋史学思想从发生、发展、繁荣以至于消沉,整个过程都与时代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宋初皇朝新建,史学思想重在效法前代;庆历之际,随着统治危机的爆发,学术领域内的变动也随之展开,史学变革遂乘势而起;嘉祐至元丰年间,统治危机持续深入,史学思想也进入新的繁荣期;北宋晚期,受党争等因素影响,史学思想呈现被异化倾向。

就正统思想而言,北宋前期学者们以传统神学理论为指导推演朝代兴替;庆历之际欧阳修以政治理性与道德理性立论,提出正统绝续说;嘉祐至元丰年间,欧阳修的主张得到学界普遍认同。

就资治思想而言,北宋前期学者重汉唐故事,庆历之际先王之道、祖宗之法受到推崇;嘉祐至元丰年间学者们在批判祖宗之法的同时,对王道的内涵展开了更为热烈的论争;晚期受党争影响,资治思想被异化。

就教化思想而言,北宋前期学者们借鉴传统手法,重构以宋朝为核心的新的伦理道德秩序,竭力维护社会的稳定;庆历之际,受新春秋学思想影响,学者们普遍效法《春秋》义例撰述历史,力求更好地发挥史学的教化功能;嘉祐至元丰年间,学者们以道德理性推演历史的发展,以义理判定历史是非并指导历史编纂,在一定程度上构筑起了道德理性在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强化了史学的教化功能。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北宋史学思想分期	2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5
一、关于北宋史学变革问题	5
二、关于正统问题	8
三、关于资治问题	11
四、关于教化问题	17
五、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22
第三节 时代与命题:解读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的钥匙	23
第一章 北宋前期的时代命题与史学对策	27
第一节 对宋朝正统性的诉求	27
一、称说运命,定宋为火德	31
二、鼓吹符瑞,作为兴起之兆	31
三、以符瑞证北宋为应运之朝	34
第二节 取法前代,构建新朝	35
一、传统以史资治思想复兴	36
二、推崇皇王之道	39
三、重视汉唐故事	46
第三节 以宋朝为核心重构新的历史秩序	61

一、以宋朝为核心构建新的统治图谱	61
二、将朝代兴亡归结为天命	65
三、重视礼乐刑罚	67
第二章 问题丛生的皇朝统治	71
第一节 紊乱的社会秩序	71
一、释、道对儒家伦理秩序的消解	71
二、社会变革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77
三、民间淫祀陋俗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82
第二节 天人关系的紧张	86
一、秉持天人相分理念	86
二、怀疑祥瑞现象的可信度	90
三、质疑北宋官方火德说	94
第三节 统治危机的化解与滋生	99
一、社会局势动荡不安	99
二、财政状况持续恶化	102
三、军事力量孱弱不堪	105
第三章 学术变革诸要素的培育	108
第一节 北宋前期的重文之策及士风之变	108
一、五代士大夫对国事的冷淡	108
二、宋初重文之策	111
三、宋初士风之变	115
第二节 北宋前期对学术研究的禁与开	117
一、禁止民间从事阴阳五行及兵学研究	118
二、鼓励探究前代历史	119
三、经学领域内的开新	122
第三节 宋代学术研究步入正规	127
一、官私藏书丰富、完备	128

二、官私藏书之处学者荟萃	135
三、学者研究方向明确	141
第四章 庆历之际的史学新变	147
第一节 新春秋学的兴起	147
一、中唐啖助学派的新春秋学	148
二、中唐儒学新变影响下的史学新变	153
三、庆历之际疑经惑传思潮下新春秋学的复兴	156
第二节 三足鼎立的资治思想	168
一、推崇王道	168
二、取鉴汉唐	174
三、效法祖宗	178
第三节 新意迭出的正统论	180
一、传统神学观的坚持与扬弃	183
二、新正统评判标准的设定	185
三、正统传承的时间特征	189
第四节 新春秋学影响下的历史编纂思想	192
一、学者对《春秋》编纂义例的探研	192
二、庆历之际的历史编纂思想	201
三、庆历史学的影响	218
第五章 嘉祐至元丰年间的史学思想	224
第一节 高扬王道的资治思想	225
一、对王道的诉求	226
二、丰富多彩的王道观	231
三、汉唐故事与祖宗旧制	237
第二节 激烈的正统之辩	240
一、章望之的霸统说	241
二、苏轼的正统论	243

4 北宋史学思想流变研究

三、司马光及其同调的正统论	246
四、欧阳修对正统论争的回应	250
第三节 构筑道德理性在史学领域的主导地位	252
一、以道德理性推演历史的发展	252
二、以义理判定历史是非	260
三、以义理指导历史编纂	265
第六章 北宋晚期党争视野下的史学思想	275
第一节 被异化的资治思想	276
第二节 历史撰述活动的畸形发展	286
一、成就有限的古史研究	287
二、国史的撰述成为党争的工具	291
三、金石学大盛	296
第三节 相对消沉的正统论争	302
参考文献	307
后记	330

绪 论

纵观整部中国古代史，自有国家以来，每一个朝代都面临着政权合法性问题、发展问题以及稳定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历代学者可谓殚精竭虑，他们从其所掌握的知识出发，根据自己对时代命题的理解，纷纷献计献策。由于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或者说史学正是通过干预现实而彰显其存在的，故而史学在历代的思想潮流中显得非常活跃。如针对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学者主张利用史学的正统史观予以应对；针对朝代的发展问题，学者主张利用史学的资治功能予以应对；针对社会秩序的稳定问题，学者主张利用史学的教化功能予以应对。由此产生了史学领域内主导中国古代史学思想走向的正统问题、资治问题以及教化问题等三个核心命题。

由于正统问题、资治问题以及教化问题等史学核心命题不仅主导着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走向，而且对古代政治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从把握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政治史等角度考虑，截取古代一个典型时段，对史学思想做具体而微的剖析就显得相当必要。而北宋史学思想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堪称典型。对这一历史时段史学思想中的正统问题、资治问题以及教化问题等史学核心命题的流变做具体而微的把握，不仅可以深化对宋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为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新视角，同时也可以加深学界对北宋政治史的理解与把握。因此这一选题有着极强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第一节 北宋史学思想分期

受时代及学术自身发展因素的影响,北宋史学思想发展变化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复兴期、变革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等四个时期。

复兴期:建隆(960—963)至天圣(1023—1032)、明道(1032—1033)年间。此期北宋文化处在恢复期,苏轼所谓:“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①陈傅良则把天圣(1023—1032)、明道(1032—1033)以前视为“守故蹈常”时期:“宋兴,士大夫之学,亡虑三变: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知向方矣,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②。史学作为宋代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处在恢复时期。

此期,就正统问题而言,学者摭拾前代学术理念,以三统、五德理论为核心重构北宋历史,竭力塑造北宋皇朝的正统形象;就资治问题而言,学者力求通过借鉴历史经验,确立其统治秩序;就教化问题而言,为了确立新的社会秩序,北宋学者利用传统的历史编纂手段,重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由于此期的史学思想主要是对前代史学思想的学习与继承,故吴怀祺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缺少创新”^③。

变革期:庆历(1041—1048)之际。因为学术史重点考察的是思想的变迁,而思想的变迁不像政治史的变迁那样截然分明,所以“学术史的年代,同普通史的年代,不能划得恰平,中间也有些参差不齐的。”^④因此,学界论及“庆历之际”,多不局限于庆历(1041—1048)年间,而是以庆历

①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6页。

② 陈傅良:《止斋集》卷三十九《温州淹补学田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第809页。

③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5页。

④ 钱穆:《欧阳修〈新五代史〉与〈新唐书〉》,《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3页。

(1041—1048)年间为中心向前后延伸若干年。如刘昭瑞认为：“北宋中期这一段时间，也就是公元11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五、六十年左右时间，堪称又一文化高峰期，这段时间包括北宋王朝仁宗、英宗、神宗三个皇帝，以仁宗的庆历年间为中心，前后延伸30年左右。为了便于概括，在文化史的研究中，可以把这一段时间称之为‘庆历之际’。”^①郭学信也持此说^②。漆侠论及宋学，认为其“形成于庆历新政（1043—1044）的前后四十年间。”^③此虽未明言“庆历之际”，显然指的就是这个时段。而李强“以庆历年间活跃士人的主要政治、文学活动时期为参照，把自仁宗天圣末到嘉祐初的二三十年时间，归于所谓的‘庆历之际’。”^④

征诸史实，笔者认为“庆历之际”的上限应在明道（1032—1033）、景祐（1034—1038）之际，下限当在嘉祐（1056—1063）年间，也就是以庆历（1041—1048）年间为中心，前后历时三十年左右。此期的特征是新思潮涌动。

所谓“思潮”，或可称为“时代思潮”，梁启超所谓：“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⑤据此，要确定一个时代是否有某种思潮，要具备两个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条件：即首先要求在一定时期有相当数量的人的思想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其次这种思想必须有一定的价值并且适合时代的要求，达到此两点者即可称为思潮。而以此两点来关照北

① 刘昭瑞：《“庆历之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人文杂志》1991年第3期。

② 郭学信：《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嬗变》，《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③ 漆侠：《胡瑗在经学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④ 李强：《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⑤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1页。

宋学术思想的发展,可发现在北宋中期确实出现过一次新思潮运动。如苏轼指出当时在欧阳修的激励下,通经与学古成了学者们的追求:“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① 此期当指景祐(1034—1038)、庆历(1041—1048)年间,因为在这段时间欧阳修多次抗颜直谏,名动海内。全祖望则明确指出,宋代学术勃兴于庆历(1041—1048)之际:“庆历之际,学统四起。”^②

在此期间,源自中唐的儒学更新运动再度复兴,古文运动以及新史学运动亦皆乘势而起,宋代学术因而进入勃兴时期。

此期学者们纷纷主张以经学思想尤其以新春秋学思想为指导治史。就资治问题而言,受经学新变的影响,推行王道,追踪二帝三王成为时代潮流,在此过程中,学者们对王道的内涵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汉唐故事受到抨击,宋代祖宗故事被推至崇高地位;就正统问题而言,欧阳修以《春秋》思想为理论依据,对传统正统史观进行改造,提出正统绝续说,从而使正统史观面貌为之一新;就教化问题而言,学者们普遍效法《春秋》义例撰述历史,力求更好地发挥史学的教化功能。

繁荣期:嘉祐(1056—1063)至元丰(1078—1085)年间。论及宋代学术的繁荣期,苏轼认为当自嘉祐(1056—1063)时期起,所谓:“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③ 陈傅良亦视景祐(1034—1038)以后为学术繁荣时期,而范仲淹、欧阳修和周敦颐在其间依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范子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欧阳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华,一本于六艺,学者经术遂庶几于三代,何其盛哉。”^④ 由于北宋史学思想的变迁是在北宋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下形成的,北宋史学思想的繁荣期与北宋学术思想相一致。

①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第316页。

② 黄宗羲辑,全祖望订补,冯云濠、王梓材校正:《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续修四库全书》第518册,第134页。

③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六一居士集叙》,第316页。

④ 陈傅良:《止斋集》卷三十九《温州淹补学田记》,第809页。

此期兴起于庆历（1041—1048）之际的新史学思想继续发展。就资治问题而言，随着学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剖析，虽然祖宗家法和汉唐故事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但就当时的思想主流而言，更看重三代的王道，在庆历（1041—1048）之际还被认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的祖宗家法，在此期间则被普遍认为是需要加以破除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熙丰（1068—1085）年间的变法活动，就是一个高举王道旗帜，全面变更宋代祖宗家法的过程。就正统问题而言，欧阳修的主张得到学者普遍认同，正统观面貌焕然一新；就教化问题而言，学者们抛弃传统的天命观，纷纷以道德理性为指导研究、评判并撰述历史，确立了道德理性在史学领域内的主导地位。

衰落期：元祐（1086—1094）至靖康（1126—1127）年间。此期不同政治派别打着以史资治的旗号，而行其专断国是之私心，从而异化了北宋的以史资治之风。历史教化思想及正统思想皆乏善可陈。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本书着重对北宋史学思想流变进行探研，由于北宋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始终围绕着正统问题、资治问题以及教化问题等三个核心命题展开，故本书所探讨的就是北宋学者围绕这些核心命题生发出的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历程。而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一、关于北宋史学变革问题

北宋史学的变革问题，在20世纪前期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刘咸炘认为受仁宗时期学术新风的影响，北宋史学思想也发生变化，如欧阳修受孙复、尹洙影响，作《五代史记》及《唐书》，“本纪用《春秋》法”。吕夏卿承中唐学者喜谈《春秋》，以褒贬为史法之流，作《唐书直笔》详言本纪书法，

“开晚宋以后之习”^①。

蒙文通继而用简约的文辞对北宋史学流变进行梳理,指出唐初至庆历(1041—1048)以前主流史学皆沿袭六朝,缺乏创新,其异端则是中唐异儒所倡导的以春秋学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新派史学,此学到“庆历时代”,随着旧学的衰落而勃兴,从支流变为主流:“自天宝、大历以来发其端,至庆历而后盛。”认为《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的修撰是中唐新史学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孙甫的《唐史记》,对中唐史学有继承也有创新,《资治通鉴》“遗褒贬,削制度,是则仿孙氏者也”。^②

钱穆认为宋代史学与汉唐史学相比有好议论的特点:“就一般而论,宋儒史学,显较汉唐儒为盛。而宋儒之于史学,亦好创立议论,不专于纂辑叙述考订而止。于著史考史外,特长论史,此亦宋代学术一新风气之特征。”^③

牟润孙对孙复的春秋学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孙复之书“别开说经之新途径,其影响所及者,不仅《春秋》之学或经学而已”^④。

刘子健称:“11世纪的历史学家掀起了一场史学评论高潮。”^⑤

王东认为庆历(1041—1048)年间,学风突变,学者们由迷信传注转为主张以己意说经,在此声浪中,宋代的“春秋学”家们上宗唐代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对《春秋》三传予以空前的怀疑与驳难,其中“孙复是这种学风的带头人”。这种《春秋》经学对宋代的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如经界的惑注导致了史界的疑古、《春秋》“笔法”影响着宋代史学中义例之学的创立、《春秋》“大义”影响着宋代史学史笔主旨的确立、《春秋》“正名”思想影响着宋代史学“正统”论的形成。随着《春秋》经学的理学化,宋代史

① 刘咸炘:《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7页。

②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6页。

③ 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9页。

④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1页。

⑤ [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学由经学化开始最终走入理学化的道路。^①

蔡崇榜认为宋代义理史学发达：“宋代史学，上承中唐以来师法《春秋》义例，以孔子褒贬笔削之意言史的风气；下受儒学更新运动和理学思想的影响，出现援经入史，以史学著作阐释儒学义理，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经世思想的一派，从而涌现出大批义理史著。”^②

吴怀祺先生认为北宋史学思想史以庆历元年（1041）为分界线，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宋代的学术思想包括史学思想基本上是沿袭前人的认识，发明不多。”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反映出的时代特点是“尊王攘夷”，特别是“尊王”的观念。后一阶段，“学术思潮是‘疑经’与‘发明经旨’的结合。”理学对史学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一阶段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可概括为“资鉴”、“求理”。^③

徐洪兴对孙复的思想进行全面探讨，认为孙复“治《春秋》舍传求经，直抒‘圣人’微旨，在学界造成新风气，对宋儒义理之学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④

杨世文对中唐啖助学派的新春秋学思想进行了梳理，指出“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⑤。

瞿林东先生认为在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两宋史学在理论上的成就十分突出。在历史观念方面，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在史学观念方面，表现出广泛而深入的史学批评意识，从而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推向繁荣阶段。其特点是具有自觉史学批评意识的史家越来越多，提出的理论问题越来越深入，开展史学批评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这几方面的“合力”，造成了中国史学在多

① 王东：《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

② 蔡崇榜：《论宋代的义理史学》，《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

③ 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第1—10页。

④ 徐洪兴：《孙复论》，《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

⑤ 杨世文：《经学的转折：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孔子研究》1996年第4期。